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子
部
·
商
君
书
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更法第一	员
垦令第二	缘
农战第三	猿
去强第四	圆
说民第五	猿
算地第六	猿
开塞第七	源
壹言第八	缘
错法第九	缘
战法第十	远
立本第十一	缘
兵守第十二	远
靳令第十三	苑
修权第十四	苑
徠民第十五	愿
刑约第十六(亡佚)	愿
赏刑第十七	愿
画策第十八	怨
境内第十九	员
弱民第二十	员
御盗第二十一(亡佚)	员
外内第二十二	员

君臣第二十三.....	員憲
禁使第二十四.....	員園
慎法第二十五.....	員遠
定分第二十六.....	員員

更法第一

孝公平画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摯三大夫御于君，虑世事之变，讨正法之本，求使民之道。

君曰：“代立不忘社稷，君之道也；错法务明主（张）长，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，更礼以教百姓，恐天下之议我也。”

公孙鞅曰：“臣闻之，‘疑行无成，疑事无功。’君亟定变法之虑，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非于世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惊于民。语曰：‘愚者暗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’郭偃之法曰：‘论至德者，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法者，所以爱民也；礼者，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于礼。”

孝公曰：“善！”

甘龙曰：“不然！臣闻之，‘圣人不更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’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功成；据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。今若变法，不循秦国之故，更礼以教民，臣恐天下之议君，愿熟察之！”

公孙鞅曰：“子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！夫常人安于故习，学者溺于所闻。此两者，所以居官而守法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，不足与言事；制法之人，不足与论变。君无疑矣！”

杜摯曰：“臣闻之，‘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。’臣闻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君其图之！”

公孙鞅曰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！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！伏羲、神农教而不诛，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，及至文、武，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礼、法以时而定，制、令各顺其宜，兵甲器备各便其用。臣故曰：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修古而兴；夏、殷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复古者，未可必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！”

孝公曰：“善！吾闻穷巷多吝，曲学多辨。愚者笑之，智者哀焉；狂夫之乐，贤者丧焉。拘世以议，寡人不之疑矣！”

于是遂出垦草令。

【译文】

秦孝公研讨治国大计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位大夫在孝公跟前侍候。他们考虑社会情况的变化，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，寻找役使百姓的方法。

秦孝公说：“替代先人被立为国君后，没有忘记国家的兴盛，这是当君主的道德准则；实行法治而积极弘扬君主的权威，是做臣子的行为准则。现在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，更改礼制来教导百姓，但是又怕引来天下的人对我议论啊。”

公孙鞅说：“臣听到这样的话：‘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取得成功，迟疑不定的做事不会取得效果。’国君尽快拿定变法的大计，还是不要去顾忌天下人对您的议论。况且具有异乎寻常行为的人，本来就要被世俗社会所非议；具有独特见识的人，常常会遭到民众所嘲笑。有一句俗话说：‘愚笨的人对于已成的定局的事也看不出来，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

情发展的萌芽状态就看出苗头来。民众，不可以和他们策划事业的开端，只可以和他们同庆事业的成功。’郭偃的法书说：‘追求最高道德的人不去与世俗附和，而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和群众商量。’法度是为了爱护人民的，按照礼制办事是为了便于成事。因此，圣人只要能强国，就不去效法那旧的制度；只要有利于百姓，就不去死守那旧的礼制。”

孝公说：“好！”

甘龙说：“不对！臣听说过这样的话：‘圣人是不改变民众的礼俗来进行教化，智者是不搞变法来治理国家的。’顺着民众的习惯来进行教化，不费功夫而功效就明显；依据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，官吏既习惯而民众又安宁。现在如果要改变法度，不按照秦国的旧法办事，要改变旧的礼制来教化民众，臣怕天下的人都会议论甚至笑话国君，希望您多加考虑才是！”

公孙鞅说：“您所谈的，是社会世俗人的言论。平庸人安于旧的习惯，学究为他们的有限的见闻所束缚。这两种人，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维护旧法制，而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革新的事。夏、商、周三代，礼制虽不同，但都可以称王于天下；春秋五霸的法度不一样，但都能称霸诸侯。所以只有聪明的人能够制定新的法度，而愚昧的人却墨守旧法；贤能的人懂得改变礼制，而不贤的人们却拘泥于礼制。跟拘泥于旧礼的人是不值得商议政事；和墨守旧法的人，是不值得谈论变法。国君请您不要再疑虑了。”

杜挚说：“臣听说过这样的话：‘没有百倍的利益，就不变更法度；没有十倍的功效，就不更换新的工具。’我还听说过：‘取法古代的法制，是没有过错的，按照古代的礼

制办事不会有偏差。’请国君还是应该好好考虑啊！”

公孙鞅说：“过去的朝代教化都不一样，该效法什么古法呢？古时的帝王的做法也不是一再因袭，我们又以谁的礼制为准呢？伏羲、神农，是重教化而不加杀戮的。黄帝、尧、舜，只惩处犯法者而不罪及他的家属。到了后来的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时候，他们各自按照实际情况立法，按需要而制礼，礼法是因时而定的，制度政令都是适合实际的，连兵器、铠甲、器具、设备，也都是适于使用的。所以我要说：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，只要有利于国家的事就不必效法古代。像商汤、周武王的称王天下，正是没有遵循古法而兴盛起来的；而商朝、夏朝的覆灭，正是因为商纣、夏桀不变换礼制才灭亡的。这样看来，不按古法办事的人，未必应受指责，而遵循古代礼制的人也不值得肯定。国君不要再为是否变法的事疑惑了！”

孝公说：“好！我听说，偏僻里巷中的人们遇事往往少见多怪，一知半解的学士常好发生争辩。愚昧的人所高兴的事，聪明的人却为它悲哀；狂妄之徒所欢乐事，贤能的人却为它忧伤。有些人用拘泥于世俗的偏见来发议论，我不为他们的说法而犹豫了。”

于是就颁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。

垦令第二

无宿治，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，而百官之情不相稽。则农有余日。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，则农不败；农不败而有余日，则草必垦矣。

訾粟而税，则上一而民平。上一则信，信则臣不敢为邪；民平则慎，慎则难变。上信而官不敢为邪，民慎而难变，则下不非上，中不苦官。下不非上，中不苦官，则壮民疾农不变，壮民疾农不变，则少民学之不休；少民学之不休，则草必垦矣。

无以外权爵任与官，则民不贵学问，又不贱农。民不贵学则愚，愚则无外交，无外交，则国安不殆；民不贱农，则勉农而不偷。国安不殆，勉农而不偷，则草必垦矣。

禄厚而税多、食口众者，败农者也。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，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。民无所于食则必农，农则草必垦矣。

使商无得余，农无得祟。农无得祟，则窳惰之农勉疾；商不得余，则多岁不加乐。多岁不加乐，则饥岁无裕利。无裕利则商怯，商怯则欲农。窳惰之农勉疾，商欲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声服无通于百县，则民行作不顾，休居不听。休居不听，则气不淫；行作不顾，则意必一。意一而气不淫，则草必垦矣。

无得取庸，则大夫家长不建缮，爱子不惰食，惰民不窳，而庸民无所于食，是必农。大夫家长不建缮，则农事不伤；爱子惰民不窳，则故田不荒。家事不伤，农民益农，则

草必垦矣。

废逆旅，则奸伪、躁心、私交、疑农之民不行；逆旅之民无所于食，则必农。农则草必垦矣。

一山泽，则恶农、慢惰、倍欲之民，无所于食，无所于食，则必农。农则草必垦矣。

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，令十倍其朴。然则商贾少，农不能喜酣爽，大臣不为荒饱。商贾少，则上不费粟；民不能喜酣爽，则农不慢；大臣不荒，则国事不稽，主无过举。上不费粟，民不慢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重刑而连其罪，则褊急之民不斗，狠刚之民不讼，怠惰之民不游，费资之民不作，巧谏、恶心之民无变也。五民者，不生于境内，则草必垦矣。

使民无得擅徙，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；愚心躁欲之民一意，则农民必静。农静，诛愚乱农之民必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均出余子之使令，以世使之，又高其解舍，令有甬官食概。不可以辟役，而大官未可必得也，则余子不游事人，则必农，农则草必垦矣。

国之大臣诸大夫，博闻、辨慧、游居之事，皆无得为，无得居游于百县，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。农民无所闻变见方，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，而愚农不知，不好学问。愚农不知，不好学问，则务疾农，知农不离其故事，则草必垦矣。

令军市无有女子；而命其商，令人自给甲兵，使视军兴；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，则奸谋无所于伏盗。输粮者不私，轻惰之民，不游军市。盗粮者无所售，送粮者不私，轻惰之民不游军市，则农民不淫，国粟不劳，则草必垦矣。

百县之治一形，则从迂者不饰，代者不敢更其制，过而废者不能匿其过举。过举不匿，则官无邪人。迂者不饰，代者不更，则官属少而民不劳。官无邪则民不敖，民不敖则业不败。官属少，征不烦。民不劳，则农多日。农多日，征不烦，业不败，则草必垦矣。

重关市之赋，则农恶商，商有疑情之心。农恶商，商疑情，则草必垦矣。

以商之口数使商，令之厮、舆、徒、重者必当名，则农逸而商劳。农逸则良田不荒，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，无通于百县，则农民不饥，行不饰。农民不饥，行不饰，则公作必疾，而私作不荒，则农事必胜。农事必胜，则草必垦矣。

令送粮无取僦，无得反庸，车牛舆重设必当名，然则往速徠疾，则业不败农。业不败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无得为罪人，请于吏而饷食之，则奸民无主。奸民无主，则为奸不勉，则农民不伤，奸民无朴。奸民无朴，则农民不败。农民不败，则草必垦矣。

【译文】

不准官吏留下当天的公事，那么邪恶的官吏也就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为自己谋取私利了。而众多官吏的公务不会相互拖拉积压，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农业劳务；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，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。农民不受害，又有了充足的时间从事农务劳动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估算粮食的产量来征收土地税，那么君主的地税制度就能统一而农民的负担就会公平了。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，就有了信用；有了信用，那么臣下就不敢搞不正当的收税。农

民的地税负担公平合理，就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；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，就不会轻易弃农改行。君主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不正当的税收，农民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会轻易地去改变它，那么民众就不会认为君主不对，而心中也不会怨恨官吏。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，心中也不怨恨官吏，那么壮年人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。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，那么青年人就会学习壮年农民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。青年人学习壮年农民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要因为谁有国外的势力而就给谁封爵位给官做，那么民众就不会看重那些所谓学问，也不会轻视农事。民众不看重那些所谓学问，就会愚昧无知；愚昧无知，就不会同外国交往；民众不同外国交往，那么国家安全没有危险。民众不轻视农事，就会尽全力务农而不偷懒。国家安全没有危险，民众全力务农而不偷懒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达官贵族的俸禄高和收税多，不劳动吃闲饭的人成群，这是有害农业生产的事。所以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的数目来征赋税，并加重他们的徭役。这样，那么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，因而那些行为游荡、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。这些人没处混饭吃，就必然会去务农；这些人都去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准商人卖粮，不准农民买粮。农民不得买粮，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。商人不得卖粮，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能囤积粮食而更加快乐，在荒年也没有暴利可得。没有厚利可得，那么商人就害怕经商了；商人害怕经商，就想去务农。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，商人想去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

能够开垦了。

声色玩好、奇装异服不准流行到各县去，那么农民劳动时就看不到奇装异服，在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。在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，那么精神就会振作；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服，那么思想必然会专一。农民思想专一而精神振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准雇取佣工，那么大夫家长就不能大兴建造修缮之风，他们溺爱的子女就得劳动而不能光吃闲饭，懒汉也不能再偷懒，而做雇工的人也就没有地方混饭吃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。大夫家长不兴建造修缮之风，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。大夫家长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偷懒，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。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，农民和做雇工的人都更加努力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许开办旅馆，那么奸诈诡伪、急攻求利、私下勾结、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就不能远行，而开设旅馆的人也就无法谋生了，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。这些人都去务农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的资源，那么厌恶农业劳动、懈怠懒惰、贪婪无厌的人就不能再靠山林湖泊任意砍柴、采矿、打猎、捕鱼。这些人没有地方混饭吃，就一定会去务农。这些人去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国家提高酒、肉的价格，加重对酒、肉的税额，让税额高成本的十倍，这样话，那么卖酒、肉的商人就会减少，农民也就不能再过分嗜酒畅饮，大臣也不会再荒废公务而沉醉在吃喝玩乐里。卖酒肉的商人减少了，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

粮食；农民不再过分嗜酒狂饮，那么农业也就不会荒废。大臣不荒废公务和醉饱，那么国家的公事就不会拖延积压，国君就不会有错误的措施了。国家不浪费粮食，农民不放松农活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加重刑罚并实行连坐法，那么心胸狭窄、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私斗，凶暴蛮横，强悍刚烈的人就不敢再争吵，懒惰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，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出现，花言巧语、阿谀奉承而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耍花招骗人了。这五种人在国内没有了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命令民众不得擅自迁移，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，那么不安心务农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，那就必定会去务农。愚昧无知、急于求利的人都能专心一意地务农，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居乐业。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，必定专心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同样地制订颁布有关嫡长子以外的贵族子弟担负徭役的法令，按照辈份大小服役，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，由掌管称量粮食的官吏按规定标准发给口粮。他们不可以逃避徭役，而想做大官还不一定能当成，所以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可能外出投靠豪门侍奉权贵，那么就必然会去务农，这些人都去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准国家的大臣和大夫们，追求芜杂的文典古籍、诡言巧辩、外出周游寄居他乡的事情，更不准到各县去闲居游逛，那么农民无处听到奇谈怪论、看到奇异的方术技能。农民无处听到奇谈怪论、无处看到奇异的方术技能，那么聪明的农民无从离开原来所从事的农业，而愚蠢的农民也就愚昧无知，不会爱好学问。愚蠢的农民愚昧无知，不爱好学问，

那就会积极地干农活。聪明的农民不离开农业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命令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女子；又命令军市中的商人，让他们每人自备铠甲兵器，使他们时刻注意军队作战军需的供求；又使军市上不准有私运粮食的人。这样的话，那么奸巧的计谋就无处隐藏，偷运粮食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，轻浮懒惰的人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游逛。偷盗粮食的人无处出售，运送军粮的人一律由公家派遣，轻浮懒惰的人不游逛军人市场，那么农民不放荡，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浪费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一致，那么升迁的官吏就不能美化自己，新上任的官吏也不敢改变统一的制度，有过错而被免职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自己的错误行为。官吏的错误不能隐瞒，那么当官的就不会有邪恶的人了。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己，新上任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，那么从属官员就可以减少，那么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。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，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处奔走游荡；农民不四处游荡，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妨害。官吏属员减少了，那么征税就不会多。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，那么务农的时间就多了。务农的时间多了，征税不多，农业不受妨害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加重关口和集市上的商品税，那么农民就不愿经商，商人就会有怀疑松劲的情绪。农民厌恶经商，商人疑惧懒得经商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按照商人家中的人口多少摊派徭役，命商人家中劈柴的、赶车的、服役的、当僮仆的种种奴仆必须到官府登记注

册，并按照名册轮到谁名下，谁就去服徭役，那么农民就安闲，而商人就劳苦了。农民安逸，那么良田就不会荒芜；商人劳苦，那么就没有余力把那些往来赠送的礼品贩运到各县。这样的话那么农民就不会挨饿，办事也不会讲排场。农民不挨饿，办事不讲排场，那么他们对公家的事就做得快，而私人的事情也不耽误，这样农业就必定兴盛。农业必定兴盛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规定给官家送粮食时不得雇用别人车子，运送粮食的车子不准在返回途中受雇给人家私载货物，车子、拉车的牛、所载粮食的重量在服役时必须和官册登记时一样。那么送粮的车子去的飞快回来迅速，这样的话，送粮的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业生产。送粮不妨害农业生产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准向官吏请求允许为犯罪的人送饭吃，那么邪恶的人就没有了主张。邪恶的人没有了主张，那么为非作歹就得不到鼓励，农民不受到伤害。为非作歹得不到鼓励，是因为邪恶的人没有了依靠。邪恶的人没有依靠，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。农民不受到危害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农战第三

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，官爵也；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。今民求官爵，皆不以农战，而以巧言虚道，此谓劳民。劳民者，其国必无力，无力者，其国必削。

善为国者，其教民也。皆作一而得官爵，是故不官无爵。国去言则民朴，民朴则不淫。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出也，则作一。作一则民不偷营，民不偷营则多力，多力则国强。今境内之民，皆曰：“农战可避，而官爵可得也。”是故豪杰皆可变业，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随从外权，上可以得显，下可以求官爵；要靡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具备，国之危也，民以此为教者，其国必削。

善为国者，仓廩虽满不偷于农，国大民众，不淫于言，则民朴一。民朴一，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。不可巧取则奸不生，奸不生则主不惑。今境内之民，及处官爵者，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，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。是故进则曲主，退则虑私。所以实其私，然则下卖权矣。夫曲主、虑私，非国利也，而为之者，以其爵禄也；下卖权，非忠臣也，而为之者，以末货也。然则下官之冀迁者，皆曰：“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。”曰：“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，则如以狸饵鼠尔，必不冀矣；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，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，愈不冀矣。二者不可以得迁，则我焉得无下动众，取货以事上，而以求迁乎？”百姓曰：“我疾农，先实公仓，收余以食亲，为上忘生而战，以尊主、安国也。仓虚、主卑、家贫，然则不如索官。”亲戚交游合，则更虑矣。豪杰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随从外权，要靡事商贾为技

艺，皆以避农战。民以此为教，则粟焉得无少，而兵焉得无弱也。

善为国者，官法明，故不任知虑；上作一，故民不营私，则国力抟。国力抟者强，国好言谈者削。故曰：农战之民千人，而有《诗》、《书》辩慧者一人焉，千人者，皆怠于农战矣；农战之民百人，而有技艺一人焉，百人者，皆怠于农战矣。国待农战而安，主待农战而尊。夫民之不农战也，上好言而官失常也。常官则国治，一务则国富。国富而治，王之道也。故曰：王道作外，身作一而已矣。

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，则知慧之人，希主好恶，使官制物，以适主心。是以官无常，国乱而不一，辩说之人而无法也。如此，则民务焉得无多，而地焉得无荒？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，国有十者，上无使守战。国以十者治，敌至必削，不至必贫。国去此十者，敌不敢至，虽至必却。兴兵而伐必取，按兵不伐必富。国好力者以难攻，以难攻者必兴；好辩者以易攻，以易攻者必危。故圣人明君者，非尽能其万物也，知万物之要也。故其治国也，察要而已矣。

今为国者多无要。朝廷之言治也，纷纷焉，务相易也。是以其君懵于说，其官乱于言，其民情而不农。故其境内之民，皆化而好辩、乐学，事商贾为技艺，避农战。如此则不远矣。国有事，则学民恶法，商民善化，技艺之民不用，故其国易破也。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，故其国贫危。今夫螟、螽、蚘、蠹，春生秋死，一出而民数年乏食。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，此其为螟、螽、蚘、蠹亦大矣！虽有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乡一束，家一员，犹无益于治也，非所以反之之术也。故先王